

处，却至少显出文学天才和“英雄”气概；她还明确表示不喜欢《女房客》，这本有缺陷的书让她想到弟弟的自毁，而他的陨落使安妮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包袱，给小妹的身心健康带来灾难性的影响。对布兰威尔迷恋有妇之妇及种种“无可救药”的行径，夏洛蒂轻蔑鄙薄、反感厌恶，浑然忘记自己也迷恋过有妇之夫，更忽略了布兰威尔不是天生的害群之马，忽略了他一度遥遥领先的文学造诣、在众多文学体裁方面的尝试、积极联系文坛名家和报纸杂志发表的努力、对小说市场未来趋势的敏锐判断等等。

无论迷思几多，19 世纪的人们将勃朗特姐妹视为离经叛道的反抗力量，以女性作家的身份书写了黑暗与禁忌（桂冠诗人罗伯特·骚塞曾回信夏洛蒂，劝诫“文学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女子的终生事业”）；20 世纪的读者将她们视为女权先驱，或将她们笔下的故事理解成史诗般的爱情（受《简·爱》里罗切斯特先生前妻伯莎的指引启发，《阁楼上的疯女人：女性作家与 19 世纪文学想象》被誉为 20 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《圣经》）；而 21 世纪的英国学者特里·伊格尔顿在《勃朗特姐妹：权力的神话》一书中，又从工业社会发展的角度，剖析了这三个太阳的另一面。

伊格尔顿表示，勃朗特姐妹



上图：桑顿村郊外的高地。

可以被称为晚期浪漫主义作家，这并不单单是一种年代学划分。她们以作家身份出现于 18、19 世纪之交，此时伟大的浪漫主义时代几近尾声，而英国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即将开始。如此，她们就成为转型式人物，活跃在高浪漫主义（high Romantic）革命戏剧的年代与危机丛生的新型工业社会诞生的交叠之际。这一时期，人们亲身体验到历史的创生过程，从巴黎到波士顿，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均发生剧烈震动，一种全新的革命情怀由此诞生。此外，后启蒙时代把人类看作理性克制动物的构想，让位于把人类看作充满激情与欲望之造物的观点，无限性（infinity）是真正的归宿。人类的创造性想象力得以

释放，与革命政治形成一种怪异的同盟关系。

于是，勃朗特姐妹既是充满自由精神的激进者，又是充满浪漫精神的保守派，她们对持异见者既同情又恐惧，对当局既心存不满又怀有敬畏。身处社会冲突的集结点、历史转折的矛盾纠结段，也决定性地塑造了她们小说的内在结构。所以，我们能品读出那些既志向满满又饱尝挫折、既孤立无着又聪明自立的主人公，品读出文明与粗蛮的冲突、教养与劳作的冲突、自我表达与自我压抑的冲突。比如《简·爱》里最具宣言色彩的对白：“你以为我会留下来，成为你觉得无足轻重的人吗？你以为我是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么？能让我的一口